

# 被上帝獎賞為「好孩子」

魯人



這個故事已成經典。一九六三年，女孩瑪莉·班尼寫信給《芝加哥論壇報》，向兒童版欄目的主持人西勒·庫斯特先生提出了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困惑：為什麼她幫媽媽幹了許多活，只被誇獎為「好孩子」，而又搗蛋又不幹活的弟弟得到的卻是甜餅。她問，上帝真的是公平的嗎？因為她看到許多像她一樣的好孩子被上帝遺忘了。

瑪莉·班尼給一向被孩子們認為無所不知的西勒·庫斯特先生出了一道難題，而且他已經收到過許多類似的信件。在苦惱的思索期間，他參加了一場婚禮，新娘新郎互贈戒指時，兩人錯將戒指戴到對方的右手上。牧師見此幽默地提醒道：「右手已經夠完美的了，我想你們最好還是用它來裝扮左手吧。」西勒·庫斯特由此得到啟發，以「上帝讓你成為好孩子，就是對你的最高獎賞」為題，給瑪莉·班尼寫了回信。信在《芝加哥論壇報》刊登，據說此信一登，千餘家歐美報刊爭相轉載。

被上帝獎賞為「好孩子」，這個童話般的答案對孩子雖是善意的小欺騙，卻能讓她很高興。在靈光乍現想到這個解釋之前，西勒·庫斯特和成人們心裏想必都清楚瑪莉·班尼和許多孩子的經歷對好孩子不公。但覺得這是小孩子的天真幼稚，隨著他們的成長，許多道理會自然而然明白，也就不會再抱怨了。不知道那個早過了童話年齡的女孩子是否已從好孩子成長為好人；也不知道她的弟弟是否從一個頑皮搗蛋的小男孩成長為有責任感、懂得關心照顧別人的男人。倒是我總有點羨慕，西勒·庫斯特的上帝獎賞論，會讓好孩子終為壞孩子所欺，而為了好孩子的名聲卻甘願忍受；並讓壞孩子欺負好孩子，並以此為理由阻止他們反抗。而這理論如從孩子的

世界延伸到成人的世界，便必是遭害甚巨謬論流傳了。

好孩子是發展成好人的良好基礎，上帝如果給好人一個「好人」的聲譽做最高獎賞，卻讓他始終處於困苦打擊之中，人們大約會極不贊同，想必全世界的人都希望好人有好報。雖然，「好人有好報」有做好人為好報的嫌疑，使做好人有了目的。但「上善若水」是一種境界，人則極難達到這心不染塵的境界。好人想有好報，旁人也願意看好人有好報，也就無可厚非了。好人是榜樣，也是標本，他們在溫暖感動別人的同時，也會讓許多普通人以他們的遭遇和結局來權衡自己的行動。另外，做好人並有好人的悲憫和胸襟是一回事；自己為害卻逼着別人做好人是一回事；為了統治哄着民衆做好人又是一回事。因此，我不相信好報是必然，並與上帝有關，反覺得：對別人說好人有好報，是愚弄；對自己說好人有好報，是愚蠢。

希望善有善報，自然也希望惡有惡報。但上帝讓「壞孩子」得了甜餅，自然也會常讓惡人享受花天酒地，這是讓人最心不甘情不願的事。這使一些人寧拋精神獎賞，而求物質獎賞；因此，罵貪官便只是痛快卻並無意義了。因為，貪官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且前赴後繼，便一定不是貪官的事，也不是個人的事，而是「人」的事。這「人」不是指區別於另一個人的人，而是指區別於動物的人，是人性，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憂國的先驅們所說的「國民性」，並可擴大至黃紅黑白各類人種的人。這「人」不改，貪婪的官員不過只是個人引注目的特殊群而已。同樣的，還有貪婪的商人，貪婪的名人，貪婪的平民百姓，貪婪的市井無賴……因為，貪婪的是人，不是某個階層。

上帝能獎賞好孩子、好人，卻獎賞不了人做好孩子、做好人的方法，方法只能靠自己思考，自己尋找，自己實施。

# 在哈佛醫院生孩子

小冰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個說法是在理的。人的生活習俗，取決於土生土長的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沒有對與錯之分。其生活方式、思維模式、所需所求，都約定俗成。中國人如此，美國人亦如此。

哈佛大學的婦兒醫院，留給我令人回味的故事，小女兒在那裏出生，相關的時間、地點、人物還記憶猶新，不能忘記。

哈佛的師生員工和家屬，看病就醫根據不同的科別，分別定點在哈佛醫學院的附屬專科醫院和波士頓所在的麻州總醫院。布萊根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以下簡稱BWH），是哈佛大學醫學院的婦產科醫院，也是全世界著名的婦兒醫院，據說美國其他州的很多女人，都喜歡到那裏生孩子。

我對BWH的第一印象，是那裏的醫生護士都好漂亮啊！笑咪咪的，親親熱熱的。不是說產科的醫生護士很厲害嗎？怎麼是這樣？加上優越的環境，優越的硬體設施，怪不得四面八方的產婦都往那裏跑。

第一次見醫生Cline時，她笑咪咪地告訴

我：「祝賀你，懷孕了！」

聽她這麼一說，我一下子就哭了，搞得她莫名其妙。

「怎麼是這樣啊？」她感到不解。

「我是中國人，已經有一個孩子了，我們每對中國夫妻只生一個孩子。」我說。

「哦！」她若有所思。

「生了再說吧！多好的禮物呀！還有什麼比孩子更重要嗎？」Cline又說，是安慰，也是開導。

Cline是一位漂亮的婦產科醫生，她屬於那種只要你有機會和她說說話，哪怕只說一兩句，就會讓你很久很久不能忘記的女人。她看上去不到三十歲，尚未當母親，可是在她的聲音裏，卻有一種溫柔憨厚的女人氣息。她與你一起分享快樂、憧憬美好未來，幫你化解憂愁、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那是一種難得的、與眾不同的、剛柔兼有的女性美。

Cline多少安慰了我，但是我心情仍然不爽，那天我不安地走出診療室。根據波士頓的法律，我什麼都不能做，也什麼都做不了。我坦然接受「多好的禮物」，等待與孩子見面。

從此，Cline成了我固定的孕期和產期醫生。

# 從霓裳演變透視法國大革命

胡艷麗



服飾的變遷史，折射一個社會的變遷史。將歷史上不同時期人們的服飾連綴成線，將恍如進入一條通往過去與未來的時光隧道，那些已然褪色的服飾，承載的不僅是霓裳羽衣曲，更多的是當時社會、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記憶。

由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學者湯曉燕所著的《革命與霓裳：大革命時代法國女性服飾中的文化與政治》，重現了法國大革命時期女性服飾的演變史，作者深入探析了女性服飾變遷背後的深層原因。在我看來，全書猶如一首時代悲歌，而那些誇張的服飾，正如一面鏡，將一個時代的靈魂病灶以形於外的方式展現出來。怪異的服裝，有時是女性無可着落的情感的外現，有時則是女性無聲的吶喊。

從大革命前女性服飾的奢靡浮華、革命時期的向男性化靠近，到革命結束後女性服裝在歷史縫隙間的輕薄透露，再到理性優雅的漸漸回歸，這一波三折的服裝演變史，恰恰形成了貫穿法國大革命始終的歷史霓裳別冊。

大革命前夕，凡爾賽和巴黎上流社會的女裝，奢華到了相當驚人的程度。路易十六統治時期，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的一款宮廷華服，巨大的裙擺誇張到要佔據幾張椅子，更為誇張的是王后時常高聳的髮型，使人的臉部常常處於整個人的中間位置，看上去像一個巨型的女巫。王后奢侈無度，推高了一個時代的奢靡風潮，一眾貴族夫人爭先跟隨王后的時裝風向，她們花費在一條裙子上的錢財，足夠一個普通百姓生活幾個世代。在女子浮華衣飾的風潮背後，分明是當時王朝的末日景象，怪異的服裝印證的正是人們內心的虛空。

巨額的服飾開支，侵蝕着皇家的國庫

，女性的妖嬈也攪擾着男性的心緒，因此一批哲人、政治家將指摘的矛頭對準了這些貴族女性，認為她們比火和毒藥更具危險性，侵蝕了一個社會就意向上的力量。需要指出的是，不論是路易十五的寵姬，還是路易十六的王后，她們就如同中國歷史上的楊玉環、趙飛燕，真正讓國家山河日下的並非是她們的美艷惑主，而是當政者自身的治國不力，以及難以擺脫的制度性衰落。

大革命時期，女性服裝的風向驟變，人們紛紛丟棄曾經的華服貴飾，輕快簡潔的風格在坊間迅速流行。此時，服裝成爲一種表達政治立場的工具，一些女性穿着象徵着新生國家的色彩或者穿着來自民主主義國家的服裝款式來展現自己對革命的支持。這一時期，革命女性中走出了一批「亞馬遜女戰士」，她們把自己打扮得像個男人、殺手，以此挑戰社會上公認的女子謙遜美德。

這些激進的革命女性，遭到了男性的激烈反對，他們不允許社會上曾經穩固的性別秩序被破壞，更不允許男性的絕對統治有一點點動搖，一紙意在允許女性參政議政的強權法案公布，女性追求政治權利的道路由此關閉。在公開的慶典之上，女性形象被束縛在慶典背景中，她們要代表的是純潔、端莊、謙遜，只能以依附在男人背後的女性身份低調行事。當美麗而具才華的羅蘭夫人因「擅越自然本位的錯置，忘記適合她本身性別的德行」走上斷頭台，一個時代女性的悲哀彰顯無疑。

革命平息，社會待興，在這樣一個歷史夾縫中，一群身着輕薄半透明衣物的「絕美女人」，如歷史的幽靈般出現，撩動了社會脆弱的神經，但她們的出現僅是一場鬧劇，輕薄的服飾只是女性在大革命時期被壓抑太久的情感的變形表達。在短暫的釋放之後，女性漸漸回歸到了本常的狀態，優雅、簡潔的服飾重歸人們的生活。與此同時，法國的社會秩序也步入重建的軌道。



▲《革命與霓裳》，浙江大學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四月出版 作者供圖

翻開書中的圖片，一些所謂簡樸的服裝，在我們今天看來，依然是繁複、非自然的，而所謂的宮廷華服，就如同舞台上的戲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歷史成就不同的服裝風格，歷史上人們趨之若鶩的服裝，今天看來早已是明日黃花，我們在其中擷取的是創作的靈感和對過去的理解，而絕非簡單的再現與復興。在世界文明演進發展的過程中，歷史與文化承載更多的是供後人反思、借鑒的職能，它們是前人栽下的糝雜着社會與人生五味的智慧之樹。

# 禁酒與反吸煙

楊繼良



人們從喝酒吸煙中尋找樂趣，中外皆如此。但從兩大國——美國和前蘇聯來看，他們居然曾經無法忍受酗酒為害，到了嚴禁釀酒的地步，卻是中國所沒有過的。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六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關於加強反酗酒和酒癮，消除私釀酒》的法令。蘇聯人民的生活就急劇改變，蘇聯國內開始了大規模的反酗酒運動。他們這個法令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廢止，但我一九九〇年去蘇聯時，至少還沒有完全恢復酒的生產。我離開北京前，朋友告訴我應該買兩瓶「二鍋頭」帶着，會有用，於是，在北京火車站買了兩瓶。一瓶，用來賄賂乘務員；第二瓶，跑來一個穿制服的，拿出身份證自稱是「克格勃」，說我是違了禁，想必是他知道乘務員從我處得到了一瓶酒，我膽子特別小，遂乖乖地奉上了另外一瓶。禁酒後，俄國私釀酒盛行，最終還是得順應民意，無疾而終。

俄國人酗酒，跟那裏天氣過於寒冷有直接關係吧，借酒取暖。酗酒問題看來還遠未找到解決的良方。俄國姑娘二十歲之前的確很美，我的印象是個個堪比天仙化人。和中國接壤的地方，俄國姑娘希望嫁給中國人，都說因為俄國男人酗酒，不能共處。當年頒布禁酒令，原是想戒此惡習，看來收效有限。

美國地處溫帶，沒有借酒取暖的需要。但他們歷史上曾有兩次禁止釀酒的思潮。第一次在十九世紀初，那是出於基督教信仰的動機。第二次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大規模開展工業化，需要頭腦清醒的工人。禁止這兩次思潮，美國政府多次頒布禁止釀酒的法令。但除鼓勵了私釀酒外，並無正面的效果。我到美國以後，倒是領教了美國一種因酒而引起的心理疾病——「酒精中毒」（Alcoholism）。這可能是長期過量飲酒、也可能是一種遺傳的基因造成的。得了這種疾病，不由自主地不醉不休；事業上很成功的體面人，往往倒臥路旁，要由警員來收拾局面。這個病是如此普遍，全美各地都有「匿名酗酒者協會」的組織。同病相憐者定期集會，各人自述飲酒的為害，互相啓發、鼓勵戒酒。

我們中國人喝酒不見得少，每天就着小菜，「喝點兒小酒」，帶着醉意上

床、不再吃晚飯的人，在我的親屬中也有。但這些人頭腦都清醒，沒有見過失去自控能力的。我還常常覺得我們中國人比較有自制力。最近跟朋友談起這件事，她說「酒精中毒」的問題在中國也有，但同胞們至今以自己的「酒文化」為榮，在酒席上把對方灌醉，會洋洋得意；自己醉了，還居然敢「醉駕」。但是，我們在這裏的同胞聚會，備有啤酒，如果回家需要駕車，會互相勸說不可喝酒，因為執法很嚴。如果因而被吊銷或被暫停駕照，後果嚴重——上不了班了！

煙和酒都屬於生活習慣。據科學分析，香煙中的尼古丁能夠提高人體的應激激素水準，同時減少吸煙者從酒精中得到的快感，進而促使他們渴求更多酒精。還有研究發現，一個人如果在十幾歲的時候染上吸煙習慣，晚年時可能更容易出現酒精濫用。因此如何減少煙民，也是和防止酗酒有關的話題。

大約二十多年前，我從收音機聽過美國電台組織的對吸煙為害的辯論。那天，煙草公司僱用的辯論員竭力狡辯，說尼古丁對人體的為害並無科學證據。反對方面的辯論員——一位女士突發問：「請問你自己是不是吸煙呢？」煙草公司辯論員被迫坦言「我不吸煙」。女士回應：「我沒有其他問題了」。她這最後一招，揭露了對方的虛假，實在高明！此後，在我接觸的當地大學中，首先是教授們都戒了煙，因為大家都覺得吸煙者是教育程度比較差的群體，恥與為伍。聽到這個廣播後的第一個冬天，有些年紀比較大的職員還會在冰天雪地中，跑到大樓門外在寒風抖索中過把癮，因為樓內已經不能吸煙。那個冬天過去後，再也看不到這種「景色」了。

可見，知識水準的提高、社會輿論的變化，是戒酒、戒煙的關鍵。美國人舉行雞尾酒會，各人自己斟酒、自取小菜點心，絕對看不到勸酒的，當然私釀酒也就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荷里活電影中過去常見的「一支在手」的愜意、優雅姿勢，現在再也看不到了。俄國人怎麼樣了，二十多年以來，沒有再去訪問的機會，別來無恙乎？從國內電視台節目中看到，我們還有把「酒文化」和「煙酒不分家」作為文化傳統來說事的，國內煙草局負責人居然說在香煙的包裝上加印勸阻吸煙的警示圖標，是「不符合中國文化傳統」。我們還有漫長的道路要走呀。

# 五月建陽謁宋慈

張桂輝



▲矗立在宋慈廣場北端的宋慈雕像 張桂輝攝

拜謁宋慈，不能不去宋慈廣場。建陽人民爲了紀念宋慈，二〇〇八年，由政府斥資，在童遊嘉禾大道與東橋東路相交處，建起了宋慈廣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太陽躲進厚厚的雲層，我和妻子從建陽火車站門口，乘坐1路公車，經水南大橋、總工會、水東大橋、童遊農貿、市立醫院至交警大隊站下車，步入宋慈廣場，頓感心曠神怡。

作爲城市標誌性建築之一、集應急避難與娛樂健身功能於一體的宋慈廣場佔地約一點二公頃，由台階、基座、雕像三部分組成。坐落在廣場北端的宋慈塑像，既是廣場的主題，又是醒目的亮點：基座高四米、雕像高十一點八六米（一千一百八十六厘米），採用整塊石料雕成，聳立在十米見方的平台中央；基座大理石正面，雕刻着二〇〇八年五月建陽市人民政府撰寫的宋慈生平簡介。其他三面浮雕，分別反映宋慈刑罰、洗冤、撰

著的情景，雕刻頗爲精美，人物栩栩如生。宋慈雕像，身着宋代官服，正氣凜然、剛正不阿，給人以莊嚴、肅穆、大氣的視覺。遊人訪客，既可站在廣場仰望宋慈，也可順着南北十級台階，登上平台近距離欣賞浮雕。

宋慈是寶慶二年走上仕途的，成爲大宋提刑官後，憑藉其出類拔萃的法學才能，破解了很多疑案、冤案。更爲難能可貴的是，他爲民洗冤，潔身自愛，成爲當時難得的清官。離開宋慈廣場時，江西李子民先生那副對聯，又一次浮現在眼前：「爲黎民造福，替朝政分憂，家無珠寶慶無驗；幫死者申冤，給生人解冤，書有真傳口有碑。」

綜合幾天的尋訪拜謁，我心裏生成這樣一個判斷：建陽人之所以要把宋慈雕像高度定爲一千一百八十六厘米，除了象徵宋慈出生年份，應當還有一層意思——讓每一個前來拜謁者仰而視之。是呀，無論是從法醫鼻祖角度講，抑或是從古代清官角度論，宋慈都是一位值得仰視、應當仰視的先賢。（下）